

第十章

以青春救乡村

——福建省秀屿区东峤镇汀塘村乡村建设工作纪实

张俊娜 江丽丽 吴瑞^①

【导读】与21世纪前十年兴起于税费冲突之际的乡建案例不同，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福建汀塘乡建，缘起于爱乡富商主动“回哺”。而闽西地区特有的风土民情村庄政治，也塑造了本方水土的乡村建设形态。年轻的志愿者们既要做小朋友的“大姐姐”“大哥哥”，又要小心翼翼地与村庄内外各脉人物斡旋腾挪，一点点地推动心底对美好乡村的想象。可能正是因为苦辣酸甜、提笔万千，写作者在正文案例之外，又辟出大篇幅来袒露内心的纠结、感动、无奈和期待。这一扇扇敞开的“窗口”，仿佛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可以体验写作者心绪变化的私密空间。都说乡村的成长，也是人的成长，这当然包括实践者们自身的成长，以至在种种挫折后，看到年轻志愿者们由“慌乱忐忑”到对“因人成事”的淡定理解，忽然让人感到一种五味杂陈的老练。至于“乡村建设的意义”，究竟是用来“骗取村民和政府支持的说辞？还是我们说服自己能够留下来

^① 此文由汀塘社区大学前后三任负责人张俊娜（2011.7—2012.2）、江丽丽（2012.3—2013.8）、吴瑞（2013.9—至今）联合完成。文中出现的村民用化名或代号。

继续做的理由”的争论，恐怕也难有个答案。

在台湾地区的商场里与柜台小姐闲聊，得知她在台北市一所普通大学读书，我问她将来的就业选择，她说不知道，眼里透着忧虑。近年来台湾经济并不景气。我随口说，去大陆吧！大陆工作机会多。她马上说，不行！我走了，台湾怎么办？我要留下来帮助台湾。我不忍心追问工作没着落的地打算如何帮，因为她的语气如此坚定。我想到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走出大学，直接来到了乡村，二十来岁的年纪，充满了憧憬、热情，当然也有迷茫。很多人问我们，想建设什么样的乡村？说实话我们常常答不上来。但我们仍然留了下来。我们凭什么做乡建呢？一没专业技能，二没社会资源，三没工作经验。我们有的只是青春。

2010年，邱建生老师的乡建工作广受赞誉，一些人希望他将社区大学开到更多的地方。而福建省域的公益事业主要聚焦在捐资助学上，对于乡村社区的发展，还未有专门的公益资金支持。民非注册也没放开，地方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社会建设行为仍持犹疑态度。因此乡村建设实践困难重重，一路走来，步履维艰，几至经营惨淡，一个项目点只有一个人员在苦苦支撑，仅能维持其“活着”。

刚巧此时，正荣集团新上任的CSR负责人期望能找到一条新的公益之路，不是短暂地提升弱势群体的物质水平，而是带来具有生命力的影响，使之具备某种改善自身或地区条件的能力，继而促进社会的美好发展。西部阳光基金会时任秘书长梁晓燕将福建地区的乡村建设事业推荐给他，由此，正荣与乡建搭上线。经过2010年一年的接触，双方取得高度互信，展开了密切合作，2011年在福建东、中、西部皆布下试验点，包括汀塘村。

一、汀塘村概况

（一）村容村貌

汀塘行政村隶属于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分为汀坪、欧厝、李厝、南坪、下厝里自然村等8个村民小组，距镇政府所在地约5公里，距莆田市区约30公里。交通便利，西邻上塘珠宝城（仅一沟相隔），北靠省道笏埭公路，南临湄渝高速和兴秀肖高速，石城疏港大道（村民按其宽度称之为“60米路”）贯穿境内。

汀塘村之所以带“塘”字，因村内有较多的水道、池塘。东圳水渠从村庄的东北面经过，为村内的农田提供灌溉用水，灌溉面积50亩，但是最近十年来东圳水渠的水减少了很多，常年断流。西部有一条水沟，为本村灌溉和排洪的主要河道，将村里的耕地和盐碱田南北隔开。2011年我们刚到汀塘时，看到池塘、沟道被人为填埋占用，或被水浮莲、芦苇和黑土等垃圾“霸占”，池塘之间缺乏流动，变成一塘死水，恶臭连天，部分沟道十米宽的水面仅剩半米。

全村耕地面积768亩（其中水田403亩，旱地365亩），林地30亩。拿村民的话说“人均不到三分地”。妇女们利用这稀少的土地种些花生、地瓜等，供自家食用。她们珍惜土地，精耕细作，连公路沿边的一缮地也会被勤劳的老人种上一排花生。

（二）婚姻家庭

全村常住人口中，非农村户口的人有172人，占4.68%；农村户口的人数为3507人，占95.32%。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村里50岁以上的妇女大多数不识字，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

莆田农村由于社会文化活动不够活跃，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开放的先进地区相比，莆田男女自由恋爱的少，遵从长辈意见的多。而一些封建思想、世俗观念浓重的家长一般都会包办婚姻。虽

然如此，莆田的离婚率还是很低的，大家会凑合过一辈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定了一个人就要跟过他一辈子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旦离婚就会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这对于要面子的莆田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家庭中，妻子负责一切家务事及田里的活儿。丈夫负责外出赚钱。丈夫在家几乎不做饭不下田，一些男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家有多少田地。莆田女人的隐忍、勤劳在福建省是出了名的。因此，莆田男人落下了“大男子主义”的名声。女性很少在村里公共场合表达意见，她们认为抛头露面的事情是男人干的。

每户家庭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如果前几胎是女孩子，那么女性要一直生下去，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如果第一胎是个儿子，那么后面生男生女都不会太紧张了。

当地政府官员和村委无奈地说，计生占他们工作量的百分之七八十。镇里给每个村都分了计划生育指标，然后根据各村完成的情况进行评比，并进行相应的奖励和处罚。在我们刚进入汀塘村时，从村委那里了解到，那两年（2010—2011年）的计生工作指标很多都没有完成，在镇里排名一直是垫底，村支书曾经因为没完成指标在全镇村干部会议上做检讨，挨上级领导的骂。而村民们也常常对村委粗言冷语。村委表示工作压力很大，在他们看来，计生工作吃力不讨好，导致干群关系不融洽。

（三）社会经济

村民土地人均不足三分，百姓靠农业是无法供养家庭的。于是改革开放后，村民纷纷外出打工，打工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汀塘在外经商者一般学历较低，十之八九小学没毕业，多是先经过几年外出务工，积累经验和学习技术之后开始摸索创业，或是通过亲朋纽带关系开创自己的事业，“同乡同业”现象普遍。莆田人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他们在家互相计较争斗，邻居间为了一锄

头的地而争得头破血流；莆田人在外却紧密抱团，互帮互助，开创了金银加工、木材加工、民营医院等商业帝国。如今，汀塘籍商人遍及全国，甚至在国外也有分布（东南亚、非洲、中东皆有村民在），著名的有欧家三兄弟分别创办的欧氏集团、正荣集团、融信集团。

有的家庭为了赡养老人及照顾小孩，无法外出，一边种着一亩三分地，一边在家里做来料加工：金银打磨、服装缝合等。很多家庭都放有一到两台缝纫机承接来料加工。家庭加工按件计价，村民每天收入在 100—200 元。

由于村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有的靠经商，有的靠打工，有的靠种田，导致村庄贫富差距很大。我们走访发现，一户人家刚盖了新房，室内墙壁没有粉刷，露出红砖。床是一块木板，下面用砖头垫了四条腿。我们也去了高收入的村民家参观，内部装修富丽堂皇，六层楼，据说造价 500 万元。时任村主任介绍，当地贫困人口占七成^①。

（四）村庄政治

汀塘村没有集体经济来源，村委的一切开支来源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及向当地富商“化缘”。村委工资来源于上级，工作考核来源于上级，村“两委”的工作围绕乡镇制订的各种指标开展。在这种情形下，村委很难成为“保护型经纪”，加上计划生育的硬性任务，可想而知，村委和村民关系上存在严重的紧张感和对峙感。这给乡建开展社会建设工作留下了空间。

莆田人的矛盾性格也反映在村民对村委的态度上。一方面摇头叹气，觉得村委人心不善，贪赃枉法；一方面，习惯于唯村委是瞻。在社区大学召集村民做什么事情时，村民总是向我们建议，你们先

^① 2011 年访谈村主任。

征求一下村委的意见。

我们进入汀塘村时，村支书欧成功常常向我们倾诉其内心的郁闷和纠结，甚至因为工作失眠，还得了神经性头痛。他的口头禅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知道自己角色的重要性，所以在某些受不了的时刻，也敢摔了上级电话，愤愤地说不干了。

他又舍不得走。看着村庄在自己手下慢慢改变，这给他带去巨大的成就感。他喜欢在村里待着，不喜欢城市生活。他自豪地透露，有个算命先生说，汀塘发展的辉煌二十年要来了。

二、汀塘社区大学成立

（一）乡建来到汀塘村

该村外出富商热衷回馈桑梓，已有修路建校、举办乡村文化节等义举。2011年应热心家乡发展的正荣集团公益事业部门领导的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来到汀塘村，希望以汀塘社区大学为载体，协助当地开展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为汀塘村的综合发展服务。通过培育汀塘的文艺、体育、经济等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拓展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村民的经济文化合作。

这是乡建团队在福建地区成立的第三个乡村社区发展项目点，之前两个点分别位于福建的西部和中部。乡建团队希望借助莆田汀塘项目点的成立，探索福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建设工作。基于前两个项目点的教训和经验，汀塘社区大学将最初半年的工作目标定为：社区动员，落地生根。

（二）社区大学落地生根

在乡建十多年总结出来的“文化入手，成本最低，见效最快”

经验指导下，汀塘社区大学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联手镇政府、村委、村小学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活动。

1. 夏令营让村民们认识了社区大学

乡建福建基地认为，农村夏令营是一个肩负着改造农村教育和大学教育双重使命的良好纽带。同时，大学生和孩子们还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在地化知识系统构建中的一环。所以乡建福建基地积极筹备，从全国各高校招募优秀志愿者，集中培训一周后，分配到三个项目点，开展为期三周的夏令营，调研及开展村庄文化活动。

汀塘村的夏令营异常火爆，共有 300 多名小学生及中学生报名参加，即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在学儿童。夏令营课程丰富多彩，充满趣味。我们乡建基地的志愿者采用参与式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主体意识，借鉴了国际“阿福童教育”的教学模式，结合汀塘村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举办游戏教学，培养起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对家乡的热爱。

夏令营结束时，乡建团队组织了“舞动青春 情满汀塘”的汇报演出，给学生及当地村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乡镇领导莅临指导及观看，并为大学生志愿者和支持夏令营的热心村民颁发志愿者证书。上千村民怀着好奇心来观看，这群大学生志愿者到底干了什么？当他们看到自家的小孩子站到舞台上大大方方地表演时，兴奋了。社区大学不失时机地介绍自己，在晚会上亮相发言。

夏令营期间，大学生志愿者每天去家访，同时开展的还有走家串户调研，极为有效地宣传了社区大学。

老村支书说，过去从来没看到小学生在路上主动跟老师打招呼的。那年居然听到他们对路上碰到的大学生志愿者说：老师好！由此他认为夏令营让村里小孩子们更懂礼貌了。他从夏令营认识了社区大学，虽然不太懂社区大学到底要干什么，但他心里认定了这是个好事儿，是对汀塘村民有益的事。之后老支书在社区大学举办的活

动中，屡屡伸出援助之手。并积极向其他村委及村民介绍社区大学。他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听到他的讲述，很感动，直接从兜里掏出三千元钱捐给社区大学。刚好那段时间志愿者在教妇女们跳广场舞没有音响，于是拿这个钱买了一个带轮子的音响。

夏令营之后，社区大学还参与到村小学的代课。小学校长希望给社区大学安排一门课，每班每周一节，社区大学自主决定上什么课。考虑到学校既有的课程现状，我们选择了给孩子们上美术、音乐、阅读等课程。因为我们常常外出，间或人手不够，导致课程断断续续，时常暂停。

除此之外，我们还尝试了其他项目，比如成立小志愿者协会。协会主要由三年级和六年级的小朋友组成，通过给大家培训“志愿者精神”、带领志愿者去老人协会打扫卫生、参加爱心互助大卖场、图书室管理、爱好环境宣传等，培养小孩子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奉献之心。两次活动后，因项目负责人的离开而中断。一年之后，在一位实习生的努力下，重建小志愿者协会，并分成四个小组：环卫队、记者团、图书室管理员、扫盲班小先生。实习生离开后，再次中断。在乡村驻点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不稳定的，工资低、工作压力较大，不能被大家理解和认同，很多实习生没有办法留下来，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强，很多很好的项目就没有办法开展下去，不仅仅在汀塘村，在其他的乡村也是如此。

夏令营期间，通过家访，志愿者发现家庭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但苦于夏令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无法带给孩子们更多改变。于是社区大学想尝试做一些后续跟进，发起了“成长陪伴计划”，在家长的同意下，有兴趣的孩子们可以来社区大学和志愿者同吃同住两周。我们希望以自身言行做示范，影响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做事主动性、人际交往能力、文明礼仪等；希望以孩子生活观念和日常行为的改变，带动家庭的变化，比如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爱护环境等，进而促进汀塘社区更加美好和谐。成长陪伴

计划很受关注，通知一贴出，孩子们争相报名。时间都排到了半年后。项目开展了两期后，由于暴露出很多问题，于是中止了。

延伸阅读

24

志愿者的反思（一）

从以上那么多的“希望”可以看出，我们对自己开展的农村工作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赋予了事情本身很多“意义”。但是项目本身的期望，与执行项目的工作人员的能力是有距离的。当我们作为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时，我们刚踏入社会，刚开始学习如何做饭，正毛手毛脚不能自顾呢，却需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真是很重的负担。有个小女孩儿早晨突然流鼻血，把我们吓坏了，简直手足无措。并且，我们每天特别忙，常常熬夜到十二点才睡觉，这并不能给与我们同住的孩子带来好的影响。

经历种种挫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终于理解了一个词——“因人成事”。我们也更趋向于踏踏实实地做小事，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创意时，首先想的是它的可执行性。这也使得外面来的专家和领导在给我们善意地提各种建议时，看到的却是我们无动于衷的表情，也许他们会认为我们在给自己找各种做不成的理由。或许我们会礼貌地点头称赞，“恩，您说的有道理”，可是一转身，撇撇嘴摇摇头。有时候实在是被对方的热切逼得受不了，就丢句狠话：“要不，您来做？”我们多么希望那些见多识广的专家和领导不只给建议，也能成为行动者，和我们一起陪伴村民成长。是的，是陪伴，不是视察。

我们团队内部也开始了争论，我们做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意义”可言。那些意义是我们“骗取”村民和政府支持的说辞？还是我们说服自己能够留下来领着微薄的补助，每天灰头灰脸继续做乡建的理由？还是它真的就有意义而我们认识浅薄不确信？



2. 扫盲班让村民走进社区大学

村里阿姨看到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于是跑过来问，可以教我们识字吗？社区大学回应村民需求，在暑期开办了扫盲班。大学生志愿者白天教小孩子，晚上教他们的妈妈和奶奶。

暑期结束后，大学生志愿者纷纷离开，但扫盲班却坚持办了下去。由懂莆田话的江丽丽任授课老师，编辑教材。江丽丽 2011 年由福建农林大学本科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教村民识字。

妇女们忙完一天的活儿后，拿起书包来到社区大学，围坐在圆桌旁，学习说普通话、写字。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妇女们丝毫不因免费就不珍惜，她们比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都认真。她们看到社区大学的志愿者们每天吃得简单，青菜也没几根，常常心疼。于是从家里拿来自己种的菜悄悄放进厨房；开蛋糕店的妇女提了一袋袋的鸡蛋糕往社区大学送；送花生，送腌咸菜……以至有一次算账，大家惊奇地发现一周才花了 6 元的生活费！

从村民的角度来讲，扫盲班的开展对汀塘村妇女的文化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也是培养妇女自信的一种方式，从社区大学层面来讲，增加了村民对社区大学的信任度，也有利于村民自组织的培育。从社区层面来说，增强了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性与情感的培养。

3. 各种文化活动让村民熟悉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入驻汀塘村后，为了能够尽快扎根社区，让汀塘村村民、村委会建立对社区大学的信任，开展了一系列“轰炸式”的活动：最初是借势大学生志愿者来盘活整个社区，之后半年又举办了4次的大型活动，覆盖老人、妇女、儿童三大重要群体，吸引了绝大多数村民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除了文化教育活动，我们乡建团队积极与村委联系，参加汀塘村党员代表大会、村民小组会议、建立团支部等，融入当地生活，利用一切机会向村民介绍社区大学。

这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为下一步工作形成铺垫。

(1) 社区带头人涌现出来。这些村民有组织力，理解能力强，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有胆量走在前头。

(2) 村民的交际圈扩大。村东和村西的在一起开展娱乐活动，一起聚餐，使他们相互认识，并成为社区活动中的好伙伴。

(3) 带动形成奉献、团结、友爱的社区氛围。每次晚会上出现的歌曲，很快便会被传唱到大街小巷。如《相亲相爱一家人》《常回家看看》《幸福在哪里》《感恩的心》《精忠报国》《歌唱祖国》等，这些歌曲表达的含义，对人心教化起到一定作用。

(4) 形成了社区大学在汀塘村的影响力。社区大学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不断有村民对我们说，你们来了之后，村里热闹很多。大家都能感觉到社区大学来了，村子不一样了。当地“做戏”时节，家家户户都宴请宾客，我们会接到很多邀请吃饭的电话，一个晚上要吃好几场。在文艺队聚餐、十音八乐聚餐中，村民常常会根据我们的时间来定聚餐时间，为的是能够让我们参加。

(5) 社区大学以务实的工作态度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省市镇等各级政府部门领导相继到社区大学调研参观。村委会举行宴请时，会邀请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参加，并且安排社区大学的工作人

员和镇里领导及村里有威望的人坐在一起。村委会选举时，邀请社区大学的负责人参与选举，同时还和秀屿区、东峤镇相关领导共同坐在主席台上，这是对社区大学的一个政治肯定。

半年目标圆满达成。第二年社区大学减少了大型活动，在和当地涉及老人妇女儿童的某些政府部门合作下，仅维持一些常规的活动，比如母亲节小聚会，夏令营，四点半课堂，妇女文艺队日常排练、图书室借阅、小记者团等。社区大学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社区组织培育上面。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大学在一开始的自身定位上，始终受到乡建经验的影响，比如“党政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外发促内生”等。我们一方面跟村民强调，“我们将来是要走的，你们要努力站出来，有所担当”；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逐步培育组织，在组织中锻炼村民，发掘有公心的村庄带头人。

延伸阅读

25

志愿者的反思（二）

这里笼统呈现出来的是社区大学刚创办时开展的几个项目。我们作为外来人，实际上“走进村庄”的行为和尝试数不胜数。我们努力地打消村民对我们的疑虑，积极地融入群众中去。有时候我们会在村庄转悠，见人就问好，靠增加刷脸次数，使村民逐步适应我们的存在。村庄一有动静，我们必去蹭热闹：我们混在一群白头发的老年人中看莆仙戏，我们跑去拍摄村委如何调节村民矛盾……

我们在农村待着，一开始赶鸭子上架，不知不觉中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不仅要和大姐聊得来孩子的教育，还能和老爷爷

谈几句养生之道；不仅会写各种活动的策划及汇报材料，还能手脚利索看到晚会上灯泡坏了立马上去搞定；不仅懂得运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为项目寻找合法存在依据，游说领导们从半信半疑中接受你、认可你继而跟你合作，还得面对不同群体时而用大白话时而用学术语言解释我们的工作——何为社区大学、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你去找村民聊天，人家正忙着，你不能双手插在兜里站在旁边看呀，于是你抡起锄头就下地了，边干活边聊天。这些还不够，某些时候儿童项目缺人手时，你得上场陪孩子们痛快地玩儿，甭管你心里惦记着这半年的工作简报要赶紧写出来提交上去，不然下个月的工资恐怕发不出来了……

一个人在项目点上，最先学会的是自己照顾自己。告别大学里吃食堂的生活，在这里每日三顿饭，你是赖不掉的。清晨起床后，做早饭，打扫院子，洗衣服，陪来访的村民聊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融入了一体。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

我们作为住在村里长期陪伴村民的年轻人，技能有限，能够教给村民的很少，反而是村民在教我们，比如教我们种菜，教我们如何处理村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扫盲班课堂上，我常常想起那句话：“当我们教会农民写‘耕耘’二字时，农民却教会我们如何犁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长期的农村工作和短期下乡不一样。短期下乡中，我们的身份是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凭借热情、兴趣很快地把农民发动起来，跟我们一起玩儿。长期的农村工作，是需要深入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需要有过日子的能力、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这时的我们，如果没有基金会的项目支持和生活补贴，恐怕没有能力在乡村生存下去。在农民眼里，我们是被可怜的对象。因为我们吃的穿的都十分寒碜，叫他们心疼。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走上乡村建设这条路的。

我常在一些会议上碰到乡建前辈们，一些 2000 年年初就开始参加乡建的青年人，现在已陆续进入中年，走在奔四的路上。经过十多年的磨炼，他们有了自己立足社会获得经济来源的一技之长，他们在生活面前游刃有余。乡建依然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他们比刚大学毕业时更从容了，农民也更愿意听他们的了，比如他们指导农民开展资金互助、生态农业等。



三、社区大学培育村民组织

推动农民自组织是社区大学的一个重要目标。社区大学认为志愿者作为外部力量进入村庄，激发村民主体性的成长，促进内部自组织的形成，并承担社区公共事务，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村庄的发展。

（一）文艺队

2011 年 7 月，汀塘社区大学迎来了第一批暑期志愿者，热火朝天地教阿姨们跳舞，一开始很多的阿姨都不敢站到广场上跳，只是旁观。志愿者自己先跳，男志愿者也去跳。过了两三天，一部分比较胆大的阿姨们加入进来，并开始慢慢学习。由于担心自己跳得不好被人笑，几个妇女还抽空在白天去社区大学找志愿者学。有一些老奶奶说闲话：这些跳舞的妇女们不害臊，敢在广场上抛头露面。但是闲言碎语挡不住大家的欢乐。过了一个星期后，社区大学召集妇女们开了个会，宣告成立妇女文艺队，这下大家有了组织归属感，更加愿意去跳舞了。社区大学趁热打铁，又鼓励妇女们参加夏令营晚会，在全村人面前表演。妇女们一方面渴望参加，一方面又不自

信地推辞。她们被志愿者逼着参加，于是紧张不已，临表演前几天，每天下午都去社区大学练习。几个简单的动作，跳了一遍又一遍。她们终于上台了，即使表演中始终害羞低着头，但能迈出这一步已是不易。

2011年9月，社区大学借着中秋节，把村民们请到社区大学，共度佳节。大家边吃月饼边看暑假的晚会视频，文艺队妇女们看到自己在台上的表演，笑弯了腰。快结束时，我们就腰鼓队和盘鼓队的组建进行通知，妇女们踊跃报名。村委会表示支持这样的文艺组织，并花了7000元钱购买了腰鼓和盘鼓。社区大学邀请了河南退休工程师74岁的衡生喜老师给大家教鼓。

衡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他自退休后就在乡村教村民们腰鼓和盘鼓等，他还会编排扇子舞，是曾经在多个乡建试验点组织文艺活动的老牌乡建志愿者。他在汀塘村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因为村民白天忙着干活，只有晚上才能学习。握惯了锄头的双手去拿小鼓槌还真是大挑战，村民们一个晚上学习两到三个动作。要么是忘了，要么是动作不标准。衡老师也不急，重复一遍又一遍。他爱开玩笑，村民们笑嘻嘻地就学会了，也不觉得乏味。

我们特别注意到衡老师会让村民之间互相教，让学得快的人教学得慢的。整齐划一的动作，如果看谁跟不上，那么他就会让大家重新做，直到所有人都跟上了，他才会教下一个动作。他是那么受人尊敬，说话又很风趣，丝毫不会让人不悦。于是村民们都听他的，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个过程中重塑大家的集体意识，从而让这样的文娱活动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教育过程。

分田到户后，大家各扫门前雪，自顾着赚自己的钱。通过这种文化活动，尤其是腰鼓，这种需要集体完成的表演，大家重新学会了相互帮助，不能嫌弃别人动作慢。待衡老师离开后，又有新人加入，村民已经可以自己教了。

社区大学的志愿者陪村民全程学习了腰鼓和盘鼓。并且，之后

每周两次的练习，志愿者们也陪着练。文艺队开始慢慢成型，可以参加村里和镇里的演出了。

社区大学有意识培养文艺队的骨干，推荐他们参加北京聚贤社举办的“农村带头人”培训，并申请到 7500 元的小额项目启动资金（共 3 人，2500 元/人）。这笔钱就作为文艺队的组织建设资金。社区大学不失时机地制定每周集体学习的制度。在组织成立初期就建立学习的制度，是从别的项目点的失败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一开始不这么规定，之后再想叫村民过来学习，村民们的反应是，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不需要！或者说我去学习，你给我多少钱？一开始这么定了，大家会觉得学习是理所应当的事，不会有那么多托词。集体学习内容有关财务知识、化妆、妇女卫生保健、土地政策、乡村环保等。外出接受过培训的村民，有了学习意识，回来后在集体学习中表现积极（如主动鼓掌、发言），她们的态度又会带动整个团队的氛围。大家争先恐后学习，唯恐被别人说闲话。

每次聚餐之后，我们会安排学习，让外出参加培训的村民们给大家分享在外面看到了什么，学习了什么经验，哪些可以应用到汀塘村。社区大学会提前准备好 PPT 及投影设备。

文艺队还选出了队长、副队长、财务人员等，并在社区大学的推动下成立了一个“文艺基金”，（由聚贤社支持的）7500 元是原始资金。如果外出表演获得酬劳，其中的 20%—30% 不会分掉，而是投入“文艺基金”中。

延伸阅读

26

志愿者的反思（三）

一个朋友参访了乡建的一些项目点后，提了一个问题：为

何乡建在农村到处推广腰鼓、盘鼓。这种文化是当地本来就有的，还是乡建强加的？她在每个乡建项目点都能看到腰鼓、盘鼓，这让她想到了“文革”时的样板戏。可查资料显示莆田当地有“车鼓舞”，打法肯定与从河南传过来的盘鼓不一样，衡老师教的盘鼓在黄河边上表演会更有气壮山河的味道。现在大家看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衡老师的学生，那是因为能够下基层教农民的老师太少了！我们找不到其他老师！

曾经有个福州的管弦乐指挥，信誓旦旦地说要培训农民，多长时间之后让他们达到去维也纳演出的水平！可是去汀塘看过之后，就不再提了。因为农民没办法每天啥都不干，就跟着他训练。农村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农民生产生活节奏的老师。

我们和分布在不同项目点的同人经常在邮件组里讨论村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所推行的是否真是村民需要的？我们担心很多活动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村民因为顾惜我们才陪我们玩，并非出于喜爱活动本身。我们也担心项目书中“通过培育汀塘的文艺、体育、经济等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拓展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间”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而非村民的实际感受。这种惴惴不安、诚惶诚恐的心情始终伴随着我们，纵使不断受到村民称赞，也不敢放松。

我们曾经组织大家围坐一圈，问她们对自己家乡的看法，或者希望自己家乡变成什么样？

妇女们抿嘴摇摇头，没有想法。或者给你一句：我说不来！推推旁边的人：让她说！

后来，当看到妇女们在一起讨论学习什么广场舞，学习什么歌曲时，我们万分喜悦。或许我们该更加乐观点，学习表达想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怎样，她们已经在表达了。

我们常常苦恼，如何发掘村民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有显性

的，也有隐性的，我们如何辨识？如果问村民需要什么，可能十之八九会得到同一个答案：钱。但是赚多少钱才算够呢？我们能够帮助村民致富吗？显然不能，反倒是村民们常常可怜我们补贴低，不断送食物和衣服给我们。

当我们看到妇女们敢于登台表演时，她们脸上的自信和欢乐让我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一年后，当我们看到村民们开始关注村庄公共事务并投入行动时，我们又找到自己的价值了。从刚来汀塘时，听到当地村民说我们这里人心不行，太自私、攀比心强，到两年后，看可持续发展协会、爱乡协会、汀塘民间理事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村庄精英们无私奉献，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人心变革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陪伴村民慢慢成长，十年也不惜。



（二）可持续发展协会

和大多数的农村一样，汀塘村的很多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或者经商。一些爱心人士期待能够回报自己的家乡，可是不知道该把资金投到哪里才合适。村干部想为村庄做一些事情，却苦于没有资金，村委也很头疼因不被信任而得不到捐款。社区大学作为一个平台，打算推动成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基金，由当地贤达人士来管理使用，于是就有了“可持续发展协会”^①，让有爱心的人可以放心地把钱交给这些有公益心的人去管理，去经营，去为村庄出谋划策。

^① 取“可持续发展”这个名字，一是呼应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二是给村民灌输这样的理念，爱护家园，庇荫后代。后来发现村民叫起来并不那么顺口。常常减缩成两字——“协会”，或者叫“你们那个什么协会”，我们自嘲这是知识分子的“掉书袋”遭遇了水土不服。

2012年3月，汀塘社区大学和村委会去沟通此设想，并且请村委推荐合适人选进入协会管理基金。社区大学和村委会达成共识：社区大学和村委会成员都只是监事，不加入协会当理事。于是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召集一些村委会自认为很有公益心的人，大约三十余人，而很多村民代表都不知道村委会打电话叫他们过来干什么，都以为是村委会有事情通知就过来了。第二次开会，二三十个人只剩下了真心想为村庄做一些事的5个人，毕竟这是村庄公益的事，需要的是自愿。另一方面，社区大学并不知道留下来愿意加入的村民能力和威望如何。

社区大学随后对这5个人一一拜访，通过和他们聊天，让他们进行再推荐，并再逐一拜访。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在观望，有些人是三顾茅庐一请再请，有些人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断推辞。经过社区大学不断游说，不断交流，最终形成了一个11人的小组。其中有一半是村委会推荐，另一半是社区大学请出山的。这个组织在不断磨合中，基本确定并稳定了人选。随后的一个月里，大家一起在社区大学开会讨论了四五次，最终确定了会长、会计、出纳、审批人及账目公开人。

刚开始协会没有具体项目，也没有资金，成立后的两三个月也没有怎么开会。但作为一个组织，需要行动来显示存在感。正荣公益基金会愿意出资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协会”持续性发展。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先做村庄环境整治^①，这样的讨论从2012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1月。

^① 实际上，社区大学2012年上半年就开始在全村做预热：首先是5月时在乡镇领导的联络下，和协会成员、文艺队骨干、村委一起去了邻近环境治理模范村参访。上午实地参访，下午便组织大家开会讨论：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汀塘村？7—8月组织大学生开展村庄环境卫生调研，访谈中问村民对村庄的看法，引导村民去关注自己生活的家园。同时夏令营中对小孩子开展以“爱故乡”为主题的课程。晚会上妇女文艺队表演环保小品，再次吸引大家广泛关注。社区大学利用各种机会，在各个群体中传播环保理念。为下一步的环境整治行动做铺垫。

协会成立的同时，十音八乐班也开始筹划了。半年后，社区大学认为参与的人越多事情越容易做，于是从十音八乐班挖掘到3个积极分子，在没有经过会长同意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们拉进协会中。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团队成员之间是否和睦，是否愿意一起共事；团队成员是否能够代表各个地方，而非都是一个派系的。后来做事的过程中，随着协会人员的增加，组织管理的成本上升了，这些问题一一浮现。协会开展垃圾治理工作后，陆续有一些成员因和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合而萌生退意。

陈三木是可持续发展协会理事，也是十音八乐班积极分子。因为十音八乐在国庆节要表演，需要用到音箱设备，陈三木提议从这10万元里面支取一部分钱去买个音箱，因为没有财务流程方面的培训，他在没有得到会长指令的情况下，就开车积极去买了，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一个人去买！这让很多人不满，虽然大家没有在会上表达，但是在背后却和会长反映，项目经费总共就10万元，不应该把1万元花在音响设备上，继而觉得他有吞钱的嫌疑。陈三木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尽心尽力做事，却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这使社区大学意识到组织制度的重要性，马上和大家一起开会讨论，通过不断参考其他地方的财务制度和《狮山报告节选》，并经过大家同意，最终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协会的财务和表决制度。会长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总是考虑周详，处理得当。

后来，购买垃圾桶的时候大家已经学会了做账，而且都做得很认真，包括如何签字，如何报账、出账，都一笔一笔地做得很清楚。

接着大家就垃圾桶的设计、宣传、安放位置与保洁员聘用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一起去购买地下管道、材料，以及请人过来施工等。因为一个团队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需要不断磨合，在这一过程中，垃圾桶的设计也逐渐成型，基本是上口小，下口大，上面安装一个盖子，他们认为要让村民学会用垃圾袋，然后统一从下口用铁

铲把垃圾弄出来，这样可防止小狗在里面乱咬垃圾，上面再弄一个盖子，防止下雨导致垃圾发臭。而用地下管道，既不容易被人偷走。也不容易坏，因为很重，需要用到铲车把垃圾桶铲到各个角落。然后在垃圾桶内部灌水泥。其中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只能用垃圾袋，而志愿者和他们说这样会污染环境，达不到环保的作用，他们不听劝告。所以志愿者也很头疼，不知道该如何引导。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些村民的观念还没有改变，或者说志愿者的宣传没有做到位，有些村民是反对的，所以社区大学不得不动员东桥镇相关人员和村委会的人，强制性放置垃圾桶。

垃圾桶安放的时候，有些村民希望能放一些到自家门口，有些人却坚决反对，并开始骂可持续发展协会的人，特别是会长。会长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几度要求退出，社区志愿者和书记一直在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会长，如果会长退出，会导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解散，功亏一篑。社区大学希望可持续发展协会能成为村庄的核心力量，这样社区大学就可以逐渐退出舞台。

后来大家经过一番考虑，建议选出一个副会长来协助会长办事。这样会长既不用退出，又可以稳住整个团队，同时可以用副会长去注册（注册需要法人代表）。但大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件事就搁浅了。

大家在社区大学召集下，聚到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开始垃圾治理的工作。大家先画出村庄的地图，然后一起骑着摩托车在村里实地勘察，标记垃圾桶的摆放位置。

团队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大家小心翼翼地探触着彼此，不断磨合。后来因为垃圾桶刷漆的事项，到底是闹翻了。部分人认为选择的刷漆工价格偏高了。做事方法的不一致，表达成言语上的冲突，导致最后有些人退出了队伍。每个成员对此都有自己的解析：

“他个性太强，听不进去别人意见”“讲话有人讲，做事时没人”“有的人嘴巴讲很厉害，但做事就……”“队伍扩大，人太多了，讨论事情麻烦”。

村里所有的事情诸如修路、装路灯、垃圾清理等都是村委们在张罗，村民们也形成了思维定势，关乎村庄的事务都指望村委。如何推动他们关注自己生活的家园，心动且行动，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如果这点不能做到，大家即使加入了这个“可持续发展协会”，也还是会陷入一种自主性困境：常常不知道要做什么，坐等吩咐。社区大学往前推一步，他们往前迈一步。

每次开会，会长都会问我们今晚会议要讲什么内容，我们就让他来决定，或者适当补充一些意见。私下里，我们不断找会长及其他理事们一对一地聊天，弄清楚他们的想法，并适时地激发他们表达出来。

村庄垃圾治理，绕不开村委，于是屡次邀请村委一起开会。但是村委有顾虑：他们在，可持续发展协会的人就无法畅所欲言。就垃圾筒设计上，村主任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协会人员马上就不高兴了：到底谁是主导？以谁的意见为主？村委干脆就不参加会议讨论了。但是他们仍关注整个事情的进展，社区大学也时时跟他们沟通。

东峤镇党委政府认为，这些垃圾桶很漂亮，所以希望在落款单位上体现政府参与，希望其他地方的村庄可以学习。于是我们的垃圾桶上出现了“东峤镇党委、东峤镇人民政府、汀塘村两委会、汀塘社区大学、可持续发展协会”五个单位。

10万元的垃圾整治资金，很快就剩剩多少了。大家一致认为有钱才可以做事，没有资金进来，事务基本上就停了。

延伸阅读

27

志愿者的反思（四）

协会理事们倚重社区大学，相互之间的看法往往寄希望通过社区大学传话。除了平素常在一起玩儿的两三个理事，协会里的大部分理事之间还是陌生的关系，内部的沟通机制远未形成。这样一个小项目客观上起到了大浪淘沙的作用，做事踏实勤勉的人得到彰显。村委也看到了民间协会的低成本运作之下产生了良好社区效益。社区大学一方面看到事情做成了，有欣慰；另一方面看到村庄精英之间的角力，有焦虑。

如何将村民推到前面，显然我们年轻人经验是不够的。跟村庄精英们的沟通也是费劲儿的，我们需要适应“话中有话”的聊天方式，琢磨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有的人表达委婉，不会直接说自己想做什么；有的人表达模糊，我们也有可能出错意。

在跟村委及镇政府的沟通中，由于我们的不自信和不坚持，一些更加民主柔和的做事方式未被采纳。

我们整天忙着协调协会内部争端，到处灭火。疲惫时，我们开始一点点反思，如何定位，如何统筹各方资源，提出方案，明确分工。把各个单位、群体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共同发力。

我们慢慢了解农村人有自己的一套处理事务的方式。村民提醒我们，要观察每个人的特点，然后考虑做事情的方法步骤，这样才能更加有效。

(三) 十音八乐班

2011 年暑期夏令营结束的汇报演出，社区大学希望除了大学生志愿者和小孩子的节目之外，还能有一些村民的节目，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老支书从隔壁村找来几位头发胡子花白的老人家，上台拉了一段十音八乐。十音八乐是莆田地区传统的民间说唱曲种，又是器乐演奏的乐种。2012 年 4 月，汀塘村很多村民向社区大学询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十音八乐班，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根据村民的需求，开班报名，并寻找老师。在镇长和镇计生办主任及汀塘村两委会的努力下，从镇里请到三位老师。

报名学习十音八乐的村民有 60 多位，面对这样一个大的班级，在热心村民的出谋划策下，建立了班级架构，选出了 5 个负责人，各有分工。A 是组长，B 负责帮忙买乐器，C 负责音响设备、印乐谱及接送老师，D 负责抄乐谱、担任会计，E 有拉奏二胡经验，就做助教。而 5 个负责人经常进行开会探讨，如该如何教学，如何更好地管理整个十音八乐班。

在管理团队过程中，几位负责人提出班级分组，每天安排一组打扫社区大学的卫生，并且不分男女老少，打扫好教室卫生方能离开。对于日常开销，他们会集中做账，集体签字，做到公开公正。如每个月初二、十六作芽（作芽就是一种莆田传统的一种信仰），要买一些水果拜谢天地和土地公，并请老师吃饭。于是大家集体开会，觉得有必要让学员们捐钱来维持日常开支，又让每个人交 100 元，其中有一些学员自发要捐 500 元，共计捐了 8000 元左右；其中，他们购买大鼓大约花费 4000 元，其他用作日常开支。学员们学习的积极性持续保持，并在 2012 年暑期“夏雨雨人”夏令营首次上台演出，得到了镇里、村里的一致好评。

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就开始嫌弃某某人拉得太快，某某人拉得不标准。原本大家每天在欧氏祠堂里一起练习拉二胡，渐渐

出现个别人组建小团队，自己找地方练。

2013年，一个去市里登台表演的机会，激化了矛盾的爆发。有些人认为，去市里表演就应该挑出精英团队，不能什么人都上台；而有些人认为，拉二胡本身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不要去伤害一些人的自尊心。最后组长提出请老师用考核的方式来选人，考核通过的就去市里表演，考核不通过的就在家里练习。一些学员害怕考核不通过没有面子，直接弃权不参加。一部分人认为，这样是在伤及一些人的自尊心，和我们的初衷完全不符合，因此拒绝这样的方式，并且产生一种看法：认为整个十音八乐班就被某几个水平高的人操控。最终一批人独立出去，自己请老师，自己买乐器，自己练习。而社区大学始终没有办法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虽然组织内部后来有分歧，但客观讲，十音八乐班的成立，提升了汀塘村村民的整体文化修养，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十音八乐班组织性较强，涉及范围广，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汀塘村的凝聚力，对汀塘村整个村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延伸阅读

28

志愿者的反思（五）

我们经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什么是民族的呢？乡土的才是民族的。在这个全球化知识系统的缝隙里，我们着力构建一种本地化的知识系统。乡村知识具有多样性，没有办法被标准化，也没有办法形成集成式的传输，我们看到社区大学可以作为这样一个载体，对应乡土知识的多样性，知识体系的在地化及乡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莆仙戏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音八乐正是莆仙戏的伴奏。

村民对十音八乐的热爱超出我们的想象，短短几天报名学习的人数达68人。社区大学的客厅不够用了，就把教室挪到祠堂，祠堂里面原有四桌麻将，乌烟瘴气，自从被十音八乐班占用后，干净许多。

政府官员看到这种现象之后，感慨说这不就是发展乡村文化吗？镇计生办主任领着省计生办领导来社区大学参观，说，看看他们贴了一个十音八乐的招生通知，字还歪歪扭扭（小学生志愿者帮忙写的），才几天就40多位村民报名，我们那么大的海报（整一面墙）贴在那儿竟然没有人看。镇计生办支付了十音八乐的老师费用，并和社区大学合作，每月开展一次针对妇女儿童的社区活动，计生办出活动经费。后来团委、妇联、文体局、宣传部、卫生院、法院、老干局……都来了，希望和社区大学合作举办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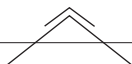
文艺队成员因为参加十音八乐而耽搁了文艺队每周的团队学习。社区大学找一个晚上召集大家开会把制度再落实，规定每个月文艺队的表演情况和账目都在月底公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区妇联愿意每个月给妇女做一些维权、法律、婚姻家庭等相关讲座。为了能够和区妇联的资源对接，我们开始把每周三定为学习日，七点半练习打腰鼓，八点到九点左右进行专题学习。

大家每次外出表演，总会拿出一定比例的钱投入文艺基金，外出表演越多，捐献给文艺基金的钱就越多。腰鼓队的妇女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表演比较多，所以要和盘鼓队分开做账。甚至经常外出表演的人，因觉得自己对文艺基金捐献多，没有外出表演的人对文艺基金捐献少而有意见。社区大学和文艺队骨干及时“教育”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不能去斤斤计较，我们要的是一份开心，而不是去在意一点点钱。

大家才没有把文艺基金分掉。

文艺队和十音八乐班的人有重合，文艺骨干们积极建言献策，越来越多地发挥主体性。让我们觉得只要他们凝聚起来，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用文艺的力量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的威力。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莆田汀塘的阶层分化。社区大学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村里有钱有闲之人参加，为这个阶层的内部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氛围。但是贫困村民日日忙碌拼命赚钱，无暇也没有信心参加活动。社区大学有滑向“汀塘村富人娱乐中心”的危险。穷人之间通常有个共享机制，这是农村穷人为他们自己创造的“安全网”。我们思考着如何通过设计项目，拓展穷人的安全网，把富人的资源也网进来，使资源能够覆盖到更多阶层的人，甚至是更多地向穷人倾斜。有老师和同人建议开展村庄内置金融，认为开展文化活动在当地形成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如果平移 to 经济领域，可以降低组织成本，产生良好的收益。但是我们认为条件不成熟，所以没有实施。



（四）爱乡协会

从2012年8月到2013年年底，通过这一年多的组织（可持续发展协会、十音八乐班、文艺队）磨炼，有经验、有公心、有想法的村民骨干涌现出来。汀塘社区大学在汀塘村三年，已经扎根村庄形成一股第三方“势力”^①。社区大学希望打造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

^① 2012年6月，老村支书（1986年开始担任汀塘村村干部，1994年担任书记，退下后继续在村委当支部委员）接受《家园》杂志采访时说：“社区大学是这里的‘第三者’，这是褒义的，因为他们来了后做了很多村干部做不了的事。”

乡村社会治理平台，缓和村民和村委之间的不理解 and 摩擦，并在共同做事中以言行影响村委。于是我们产生了组建爱乡协会的想法。

1. 协会成立

爱乡协会定位是关注村中发展和公益事业，成为村中承接外来资源服务村庄的团队，社区大学希望通过爱乡协会打造村委与村民沟通的平台，同时激发村民的自主性。

2014 年 4 月中旬，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把合适的人选列出来，然后挨个去请。最早找到的是陈三木（原可持续发展协会会长），开始的时候他一直都说自己身体怎么怎么不好，无法参加。可是一谈到将要开展的项目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闪闪发光，兴致很高。他也很感兴趣我们都找了谁来做这些事情。第二次再见会长已经是 5 月中下旬了，那天我们想去找一个自然村的两位积极分子，却没找到，在路上碰见陈三木。远远地我们就和他打了招呼，他问我们去哪里，我们把去找另外两个候选成员的事情说了一遍，接着把话题引到让他当会长的事情上来。我们夸以前可持续发展协会在他的领导之下做得有多好，并称赞他管理财务做得细致严格。他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是什么领导，应该是你们领导我才对，财务当然要严格，毕竟人家老板给我们那么多钱，我们一定得给人家做好账，不能做的不清不白的，对不起人家老板。”不知道是赞扬他奏效了还是我们的坚持打动了，他又问我们现在找到了几个人，打算怎么做，到时候他也来看看。这个转变让我们吃了一惊，有他这个表态，我们在人员上就有了很大的保障（他如果去了，那么我们要找的另外两个人也一定会去）。

陈三木对于爱乡协会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他的去留影响到爱乡协会能不能筹办起来。他是一个有眼界的退休老干部，做事有原则，懂得处理团队之间的关系，统筹能力极强。

我们第二个找的是赵乙，他个性鲜明，说一不二，敢于直言。

做他的思想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我们表现出足够尊重，所以他也跟我们谈了很多以前我们不了解的情况，表达了自己对某些人和某些事的不满。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先是泡茶聊天，半小时后他开了两罐啤酒，我们一起喝了起来。他问：“都有谁会参加？”本以为他问这个预示着有可能会参加。但聊到最后他说：“不去了，我现在在家里养养花，拉二胡，多逍遥自在！管那么多干吗，搞得背后被人家说一大通，吃力不讨好。我这个人本来就直，看不惯的东西肯定会说，不说就难受，说出来又容易得罪人，不去！你们要是来我这里玩，我随时欢迎，但是去弄那些不适合我。”赵乙的思想工作我们做了三个半小时，还是没有突破。后来又去找了几次。最后我们选择放弃，把他定位在组织外的骨干志愿者，再给他弄个身份——爱乡协会顾问。这样一来我们不会失去他的支持，平时也有借口去找他讨教。

第三个找的是许丙，他包容性很强，常为社区大学着想。又找了丁、乙、己、壬、癸……在挨个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会告诉我们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基于丰富的经验给我们提建议，如：协会成员不能太多，最多9个人就够了；协会成员之间得和得来；社区大学得一碗水端平，多听听大家的想法。

我们足足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动员工作，不停地找这些人聊天喝茶，聊完之后还得再揣摩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许这样的沟通成本很高，但是前期的铺垫越多，后边事情越好开展。了解大家的顾虑所在，预测将会出现的不良状况，可以提高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一个组织稳步前行。

2. 协会运作

爱乡协会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确定会长。会长人选涉及宗族的争斗，是我们工作两年来遇到的最大压力。有两位人选，各有支持的群体。也有人提前给我们吹风，一定要选谁谁当会长。

第一次会议上计划公开选举，但是猝不及防间被村支书点了名，要我明说谁适合当会长。正在踌躇间，苏村委推举陈三木当会长。本来陈三木就是我们期待的会长，于是我们顺势支持陈三木当会长。就这样会长被定了下来。当时料想会引起另一个派别的不满。于是就设置了两个副会长，予以安抚。

对于一个没有实际利益的会长，大家如此看重，无非就是：面子问题，财务管理问题，以及这个团队以后谁说了算的问题。这些和我们开始筹办爱乡协会的出发点是有出入的。

开完会的第二天，我便找相关人员聊天。果真失利的一方心里有不满，林丁直接提出要退出。当时我就愣住了，林丁有一定的号召力，在社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确实也为社区大学付出很多。在聊天中发现他除了以“退出”来表达不满和气愤之外，还有个想法就是再增加一个人。了解他的想法后，我们开始聊以前他为社区大学做的工作（没有他们帮忙，社区大学很多事情是不好办的），以及每次是如何地辛苦如何地无私付出。两个小时过去，我们最后撂下一句话：“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们是不会让你退出的！”那天自己真切地感受到心力交瘁，虽然他们不针对社区大学，但是相互之间的较劲儿，真是让我们为难。

回来在路上刚好碰上许丙，就拉着他到社区大学来聊天。许丙一坐下来就问我们：“你们昨天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会长是谁？”虽然他没有直接表达不满，但我能感觉到他不满意。我先解释了昨晚的情况：首先，社区大学也是打算通过选举来选会长的，但是昨晚遇到的情况很突然，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原计划继续选举，那我只能点人来做会长了。其次，我再推荐您（许丙）做副会长，分管教育基金，并且所有事情并非会长一人说了算，爱乡协会是团队成员说了算，大家一起来决定事情。他听了之后说：“是啊，昨晚要是你不选我当副会长，我就立马走人了！后边你让我来分管教育基金的事情，还是比较好的，那个钱是我去争取回来的，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呢？那些钱也是我们本家的钱关他们什么事？（教育基金是由许丙堂弟出资筹办的，许丙对教育资金的管理还是挺有想法的。所以参与爱乡协会，是希望将这笔钱更好地运用于村中教育事业。）好了，没事了，就这样吧，已经选出来了我们就不要变了，也不要再说什么了，先好好做事情，教育基金的钱我们还是得快点争取回来，不然我们没有钱，说话都没有分量。”

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了第一次爱乡协会会员，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就不能收手，做得好也要做，做不好更要做。为了把团队建立起来，即使很小的事情，也要把大家都集中起来商量讨论，不断地让大家见面说说聊聊。这中间开了三次会议，主要是确定垃圾桶、保洁员的人数和工作职责问题。这三次会议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苏村委还是不能改掉作为村委的一贯强势作风，其他的村民成员也暂时都无法摆脱心中的顾虑，无法直言不讳。就如在三次会议中，垃圾桶事宜都是苏村委一个人在那里发言，将事情拍板下来。保洁员的人数、工资和职责也都是村委开会定下来的。

苏村委觉得：“我们不要和他们（爱乡协会会员）商量那么多，他们这些人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靠他们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爱乡协会许丙认为：“村委说会把钱交给我们去做。我们这边的钱要是先垫出去，到时候他们没钱进来我们怎么办啊？要是没有钱进来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吃得有那么饱吗？闲着没事干啊，这本来就是村委他们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让我们社区大学^①来承担？”

每个人七嘴八舌都有不同的想法。现在回顾这种状况是一件好事，说明大家用心了。但当时作为社区大学工作人员的我们，感受就是压力很大。大家都按自己的一贯作风做事情，不顾及全局，没有考虑社区大学为什么提出要做环境整治。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东西，都不肯让

① 大家对社区大学有很深的认同感，出口常常都是“我们社区大学……”。

步。在村委会和村民间长期的不信任关系中，要把苏村委的意思以可被接受的形式转达给爱乡协会成员，同时不断地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我们当时完全手足无措，协调力不够，定力不够。

第四次会议我们觉得是爱乡协会的一个转折点，会上陈三木给苏村委和老支书提出来一个想法：“我们社区大学本来就是做公益的事情，没有什么钱，村委曾经说过要把钱（政府拨的环境治理项目经费）放到爱乡协会里边来，那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爱乡协会每做一个项目，就从里边抽一部分出来给社区大学，作为村庄公益事业开支用呢？爱乡协会的人时时惦记着家乡公益事业希望村委答应拨付的钱能到位。”

第四次会议，苏村委作为主持人，他说完，却没有人开口接话，尴尬的寂静。看到这样，吴瑞就主动开口一一点名，述说着这几年他们为社区大学所做的事情。最后说到了大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看法和立场也会不一样。社区大学作为外来者，可能三年五年就离开了，而大家都是当地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大家开会的时候是否可以对事不对人呢？我们好好讨论事情，不针对人。

苏村委站起来说：“首先我得代表汀塘村感谢你们这些志愿者，你们为汀塘村奉献了那么多。还有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保证，也向社区大学保证，爱乡协会里讨论的事情，即使有不同意见，我不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报复，也不会针对大家。同时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相信我们党，他说的有那肯定就是有^①。”

大家一阵沉默。沉默之后陈三木说：“钱一定得到位，我们才能做事情，没有钱我们凭什么去管那些保洁员呢？他们的工资又不是我们发的，我们说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听的呀！”慢慢地大家就讨论开了，你一句我一句的。苏村委当即分别打电话给镇上领导和企业集团捐款负责人，当着大家的面问清楚了钱都可以放到爱乡协会来管

^① 指镇政府拨钱给汀塘村做环境治理。

理。钱能够到位，大家都觉得有了干劲。

3. 协会的主动性

爱乡协会成员把环境治理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现在大家都会找我们来说：我们协会得开会了，还有很多事情都没做呢，你快召集大家开会来商量这些事情要怎么解决。而不像之前的可持续发展协会那样，是我们伤透脑筋的想会议内容了。

爱乡协会招聘了新的垃圾清理员，购买了垃圾车等工具。每天安排人员巡逻督查。由于环境整治工作受到大家的好评，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可，爱乡协会成员更有干劲了。

延伸阅读

29

志愿者的反思（六）

比较莆田汀塘和其他项目点 P 村的社区工作，外部力量进入社区后，都积极从文化入手，推动成立文艺组织或者生产组织。但是 P 村的文艺队为何专注于自我利益的实现，无法关注社区发展？可能与一开始推动成立组织时目的不明确有关，为了组织而组织。忽略了奉献精神的培育，也无意识树立组织在社区中的威望。

反观莆田汀塘村：1. 推选了一些社区志愿者外出培训，并灌输给他们一种意识，出去学习并非旅游，回来后是要带领大家做事的；2. 在文艺队，以制度的形式明确集体学习的重要性；3. 在通过社区大学牵头和做好资金保障的前提下，把村民组织推到前台，助其拥有在社区发展上的发言权，当然我

们前期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成员明白加入组织是来奉献的。地方团体的担当能力和社区威望需要通过做事来提升，汀塘社区大学后续还得强化对核心领导人的鼓励，并通过活动设计使他们在社区服务中受益，益处可以是心理上的满足、更多的参与机会、对新技术或者项目的优先接触便利等。

农村发展动力的来源必须是农民自身的干劲、观念和决心，以及来自集体主义的自助。不管是任何项目，最根本的目的仍是要培养地方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可以激发和增强农村社区积极分子的主动性。只有通过大量的尝试与调整才能让所有参与活动和村庄事务的村民树立起一种主体意识和责任感。

社区大学是个与当地习俗和传统相协调的社会组织，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工作不仅着眼于教育，更着眼于社区。“外发促内生”，除了带给当地社区一些实用的技术、简单而有效的管理方法以外，最为重要的是，要培育当地人在遇到一连串的问题时，仍能继续变革和学习的积极性。这种愿望的实现，有赖于对村民的大量培训。

我们作为“推动者”——唤起当地居民的主动性、能增强当地居民的责任感——同样需要培训，但我们所接受的培训远远不够。

我们团队现在的难题是问题意识不够，没有充分地调研，易从个人以往的见闻和经验出发，又有一颗迫不及待做事的心，觉得可以开展这个项目，开展那个项目。我们能够规划汀塘社区大学一年的工作，但是更长远的目标蓝图和行动路径，心里实在没底。

我们经常苦苦思考的，是如何实现自我学习及带领村民学习，如何引导村庄各个组织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组织的目标定位。我们担心自己开发项目是在模糊不清的思路下开展

的。我们既对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又对行动所欲达到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理解。

我们仍在努力。我们努力地深入农村的环境之中，更真切地去理解农民。



四、社会力量参与下的乡村治理新态

汀塘于 2013 年被选作莆田市第一批“城乡一体化”试点村。借此契机，汀塘画出“幸福家园”建设蓝图。编撰《美丽莆田幸福家园——汀塘新型社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以隔壁的“上塘珠宝城”作为改造依托辐射区域，对该村的新型社区配套设施进行详细的规划，包括新农村建设、警务室、卫生所、休闲广场、幼儿园、酒店、活动中心、篮球场、羽毛球场、公园、绿化带、池塘溪流、智能社区建设等。

2013 年开始启动沟道整治工作，以期恢复流水环绕乡村的原生态美景。就地取景，依托原有的池塘、老榕树、古井等修建生态公园。要恢复整个汀塘村的水系，工程浩大，不仅需要大笔资金；且需要填埋池塘占地种菜的村民们的配合。

虽然汀塘村迎来了建设高潮，但是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是靠政府项目，以后没项目了，拿什么搞建设？他也焦虑自己卸任之后，谁来带领村民继续往前走。

从汀塘村走出去的老板们开始依托社区大学反馈故里。正荣集团 2014 年开始，每年投入 100 多万元给汀塘籍老人和学生发放养老金、助学金；还参与了村庄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给村委会 60 万元用于环境绿化；欧氏集团投入 100 万元用于村庄垃圾清理；

融信集团准备投入 150 万元用于村庄池塘治理。这些捐款都是通过社区大学对接的，社区大学向资助方提交项目书，社区大学和村民骨干、村委一起将捐款落到实处。

2014 年年底，村支书谋划成立了一个汀塘村民间理事会，来协助村委处理村庄公共事务。该理事会成立后，首要推进的就是池塘治理。东峽镇政府对池塘治理大力支持，以镇政府的名义发了《关于汀塘村治理水系恢复工程的通告》。村委采纳了我们的建议，问过群众意见之后再动工。村支书要求每个村小组的负责人、汀塘村民间理事会成员拿着征求意见书，挨家挨户让大家按手印，就“是否同意对个别人非法填埋占用的沟道、池塘恢复原状”表态，90%的人把手印摁在了“同意”栏。一周的时间就通过征求意见做通了村民工作，大家不断催促社区大学联系融信集团，钱尽快到位，2014 年年底趁着旱季将池塘清理完毕。民间理事会的村民骨干说：我们这些人不缺烟不缺酒，我们既然做就得做好，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大家做事的积极性高涨，不计回报义务付出。现在是社区大学被村民推着走！

镇政府、村委、爱乡协会、汀塘村民间理事会、社区大学都在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工作有交叠，人员有重合，社区大学上下腾挪，左右解释，希望能够搭建互信的平台，大家放下成见，一起做事。显然，困难重重，但大家继续迎难而上。

延伸阅读

30

志愿者的反思（七）

多个组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并非就是好的。它也有可能导致多个利益群体的角逐争斗，形成内耗。也有可能让我们现

阶段的工作在下一阶段变得“反动”。温老师屡次教导我们，先不要预设好坏，价值判断，也不要拿西方理论来套用，而是记录、总结、分析，用实践经验来构建新的知识网络。

我们不再套用社工话语称“村民是主体，我们是协助者”，虽然负责人换了一任又一任，但社区大学可能永远都不会退出汀塘村。小资（小知识分子）对小资（农民）服务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没有理论指导，就是实践摸索。我们开始思考在做事过程中，如何和村民互为主体。我们在和村民的“斗智斗勇”中，如何改造着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言行。晏阳初曾说，“欲先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这十几年的学校教育都是教我们“脱农”“去农”。不管我们怎么深入农村，我们都无法再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乡建的路上，困难重重，挫折不断。

曾经因为被村民骂而哭泣——隔壁大叔一直蹭我们的网络用。那几天因为搞活动，社区大学志愿者多，需要用网络的人员增加，于是把他家的网线拔了。大叔一大早过来骂人：你们领导都说让我用网了，你们凭什么拔我的网线，滚出我们村！后来他妈妈过来把他拉走，指着他脑子说他这里有问题，不要跟他计较，你不要哭了。

曾经因为一个人独自驻守在社区大学而恐惧害怕，晚上听到老鼠的撕咬声，眼泪就噗嗒噗嗒掉。这样的日子有三个月之久。

曾经因为无法协调村民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按照其中一派的愿望及时表达意见而被骂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曾经因为经验不足没有按村委的心意把事情完成而被骂得狗血喷头。

曾经面对各派之间的剑拔弩张，无法形成合力，眼看着组织要解散，内心难受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全体成员会议上

忍不住流泪。

我们为什么没有离开？

因为乡亲们的殷切期待。

我们为什么离开了？

因为自己的无力。

我们手中握着那么多专家给的利农良方，也看了各种理论学说。但是现实中我们处理的却是各种关系：跟团队成员的关系、跟村民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以及跟自己父母的关系。这些无不考验着我们的自控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察言观色能力，甚至是“欺哄”能力。

乡建崇尚“事业主义”，不是“人本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维系是这份事业，而非感情。不会因为讨厌谁就离开了这份事业，也不会因为喜欢谁就赖着不走。乡建那么多年“无组织，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反而生生不息，绵延南北。

要问我参加乡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改造自我。不再孜孜以求个人世俗的成功，将别人踩在脚下，同时被更多的人踩在脚下；我们在往前走的同时，会转身注目身后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很多类似的人，比如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社区内的精英们开办金融合作的目的是“与最慢的人同行”。

我们和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分享生命故事，问及为何做乡建，发现大部分人是因为受到身边师友的影响——他们改变乡村的信念，为乡村献身的执着感召了我们。有老师说我们是没有拿到中产阶级入场券的那部分人，无法找到正规体面的工作而被迫乡建，拿着微薄的补贴，自欺欺人地拿理想麻痹自己。

有老师说我们是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中的精英。只有草根阶层才能找到社会结构的缝隙，推动变革。我们内心面临很多压力，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引，我们的身体和情感都会朝那个方向走。我们的忧虑、彷徨、纠结、看得远……这正是精英的特质。我们有能耐不从众，我们能抗拒主流的诱惑，这诱惑来自身边的亲人。亲人不断动员我们去找高薪的工作，告诉我们谁又买房买车了。我们比一般人更有孤独感和压力。一般人会因别人影响心生焦虑，比如没有完成老板布置的任务，而我们的压力来自对自己的不满。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困顿，所以我们投身苦难，并因此相逢。



附录 汀塘村扫盲班的故事

江丽丽

汀塘村部分妇女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其中有历史因素、个人需求和社会生活需求。从历史因素来看，莆田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由来已久，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经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在大多数的家庭中，都把教育机会让给家里的男丁，很多妇女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导致妇女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的情况大量出现。而如今，随着妇女地位不断提升，很多妇女表达了强烈的再学习诉求，只是苦于没有很好的途径或是平台；从个人需求来看，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电视、电脑、报纸等随处可见，已经深入农民的生活，汀塘村的妇女越来越觉得读书认字及进行普通话交流的重

要性。

如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学员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愁，家里的事也都不用我操心，就是想着好好认识几个字，以后老了，我就可以看看电视，消磨时间，要不然都没有娱乐生活，对着电视，也不知道到底看的是是什么，我现在每天拉着我的孙子叫他教我拼音”。这个阿姨只要从城里回来，就跑到社区大学叫我教她汉字和拼音，她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如另一个学员说，我每次看着那些外地人在讲普通话，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很想听懂，却没有办法，实在很无奈。学员林阿姨说，很早就想读书认字了，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之前说要去上塘夜校，可是又远又没有时间，听说这边有办扫盲班的，她大中午就跑到社区大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报名了，生怕赶不上或者名额满了：“这个社区大学真好，我们终于有书可以读了！”

从社会生活需求上看，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而汀塘村 90% 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或者经商，剩下的就是留守儿童和妇女，很多妇女经常会跟随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出去，却苦于不会讲普通话。

如一个阿姨说：“我老公在浙江义乌开珠宝店，我有时候过去看他，但在那边普通话实在听不懂，又不知道怎么坐车，看不懂路标，每天都只能待在家里，很是无聊，很快就跑回来了。”住在社区大学前面房子的学员林阿姨说：“我现在下定决心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聋哑人，虽然是哑巴，可是认识字，就在手机里输入那两个地名，售票员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不认识字就和盲人似的，寸步难行。”可见，由于社会交往等各个因素影响，学会认字和学说普通话成了汀塘村民迫切的社会需求。

她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54 岁的苏阿姨，家里卖肉，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开始拿起教材读。有次小学老师对我说，你们的学生很认真啊！我去她那里买肉，边卖肉，边学习，还拿着本子问我怎么念。

不仅如此，很多学员都是这样，她们总是那么积极地学习，当

我在教拼音的时候，我只要说一个词，她们会很快拿起手中的卡片。课后，一些阿姨会留下来把布置的作业做好，或者是把上课的内容再回顾一遍。

汀塘社区大学成人教育项目一开始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筹备和暑期高校志愿者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等到志愿者走了之后，就由工作人员担任老师进行上课，大家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跟不上，有些人因为家务繁忙也没能过来上课。学员也在慢慢减少。

扫盲班第一期学员一周上六次课，周三放假，每次上课时间为19:00—21:00，固定学员有20人左右，其他的学员是流动性的，而学员的年龄不一，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30多岁的中年妇女。为了统一管理，于10月初，设置班级组长负责制，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她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并且有部分学员习惯提前到教室，一起复习前一天的课程，大家集体朗读，互帮互助，把不懂的弄懂。汀塘社区大学的成人教育项目教学内容主要是拼音、常用字词、日常对话等，经过三个月的教学探索和经验总结，形成了乡村特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我们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开发了扫盲班的教材，在教学方式上，我们也是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来进行调整，不断满足社区需求。

在教学内容上，以需求为主，根据学员的学习需求，进行课程设置；贴近生活，以生活为素材，如介绍家庭成员称呼、水果、蔬菜、厨房用品、交通工具的名称等；加入一些经典歌曲，如《幸福在哪里》《常回家看看》，革命老歌《打靶归来》等，增加学员的学习兴趣；加入当地的传统元素，如诗歌朗诵《我是莆田人》；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如“红灯停，绿灯行”口诀、二十四节气歌、介绍了312健康疗法；在教学策略上，学习拼音时，采用播放视频的形式，拍下汀塘村的照片，制作成PPT，图文并茂，便于学员认知。应学

员要求，我们也开发出了教材，用 A4 纸打印发放，一般为二号字体，方便老人阅读和复习；根据学员容易忘记的特点，用不同的形式重复教学，如采用肢体语言，如有需要，还会采用实物辅助教学。比如，教刷牙时，拿牙刷做刷牙的动作，为了调动学员参与的积极性，会增加提问、小组接龙，或者上台表演对话等环节。

在不断教学中，这些学员也开启了自己的智慧，在不断探索怎样学习更好的过程中，他们的主体性也呈现了出来。

过去我们上什么课，她们就听什么课，现在她们会自己提出更合理的、适用于她们的上课方式，如许阿姨说，“要不我们一组学员用普通话，另外一组用本地话翻译，这样的话，一些基础差点的人就可以跟上，也便于我们更好记住”。经过试验，这样的上课方式还是挺不错的，也便于大家学习，这是她们的智慧。

简单来说，汀塘村妇女的成人学习就是“启智”的一步，学习过程中妇女们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更学会了社团生活和相互协作，以及可能涉及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交往能力，就是“开力”的一步，而这样的成人学习是为“建设”做准备的。例如提高自身、建设家庭、美化社区、发展农村妇女经济等。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很多妇女都不敢读出声音，她们害怕读错，在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她们慢慢开始大声朗读，并且是很整齐地朗读。刚开始提问时，这些农村妇女站起来都觉得紧张，现在比起之前好了很多，还可以上台进行对话。一个下雨天，卖肉的阿姨，居然在电话里用普通话和我说“老师啊，今晚有没有上课啊”，真把工作人员给高兴坏了，她们终于敢用普通话交流了，这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之前大家只是过来上课的，现在她们慢慢开始熟悉，上课的时候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有说有笑，形成一个良好的交流沟通氛围。她们自发地提议在社区大学集体聚餐，一起洗菜做饭，其乐融

融！她们常常带水果来和大家一起品尝，一个学员说：“今天发言一句啊，我们来这里就是一种缘分，聚在这里真不容易啊，我们开心了很多，不仅学到了知识，还认识了这么多人，为我们的相聚，我请大家和老师吃水果！”

重阳节晚会的时候，从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一直是互相推脱甚至逃跑，到在晚会当天能整齐地站着、声情并茂地朗读、有肢体语言地合唱，她们逐渐找到了自信，找回了快乐和开心。她们已经不再是孤单的留守妇女，而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汀塘村的妇女在上课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沉闷、单调的生活模式，重新有了踏入学堂的机会，认识了一些贴近生活的字、词，学习了一些日常对话，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汀塘村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村民间的交流，加深了村民对汀塘村的认同感。

许厝村的谢阿姨，聊天时说道：“学普通话很有用的，这次去福州，看到红绿灯，我就忽然间想起一句老师上课讲的话‘红灯停，绿灯行。’”旁边的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看来你去上课真见成效啊！她还说，现在每天我老公一到七点就赶着我去上学。说：读书去！谢阿姨隔壁村的一个阿姨，听说有夜校上，就赶紧报名了，每天晚上骑着摩托车过来。74岁的朱奶奶就住在社区大学隔壁，每日早早来报到，等着上课。她孙女说：“我奶奶每天都去上扫盲班，回来拿着老师发的教材，让我教她念。每天急急忙忙吃完饭，说要去上课！”王金笑着说，之前啥都不懂，上次孙媳妇（外地人）说，帮我把那个水桶拿过来，今天我终于听懂了，原来说的是那个装水的，虽然我现在七十几岁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学点文化好。

同时扫盲班学员上台表演，提高了她们的表演水平。当她们第一次站在了舞台上，不仅提升了汀塘村妇女的自信心，间接地还改变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如六十几岁的学员欧阿姨说，过去上课，我都是一个人晚上偷偷地从很远的地方绕到社区大学，连

手电筒都不敢开，看到人也只是躲着，不敢跟人家打招呼，问吃饭了没。怕被别人笑话说这么老了还读书。自从重阳节晚上上台之后，我就不怕了，我走最近的路，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无所谓啦！读书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啊！她是一个读书很认真的阿姨，每天晚上都很早过来复习前一天的功课。

课堂为妇女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营造出互帮互助、团结合作、共同学习的和谐社区氛围。

一天下午，妇女文艺队的苏凤霞，打电话说大家在她家唱歌，要我过去教。邻居们都聚在她家，一边拣茶，一边练歌。《打靶归来》一连教了一个星期，整首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现在已经唱得很顺畅了。苏凤霞指着旁边扫盲班的一名学员说，她一点半就把晚饭做好了！大家听了笑作一团。她们俨然已经是合格的学生。

林阿姨的女儿（初中老师）说，我妈现在作息时间都改变了，以前八点多给她打电话问在干吗，得到的回答就是在睡觉。现在呢，听到的是在社区大学读书！林阿姨自己也说我现在晚上八点都睡不着了，总是想着来社区大学转转，要不然没劲儿。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她好久没有来社区大学读书了，于是我去家访，她告诉我说最近生病了，胃疼了好几天，想想我之前在社区大学上课，每天都好好的，现在为了照顾孙子没法去上课，居然病了好多天，早知道我就去上课了，呵呵。

但是有些学员确实因为自身家庭的束缚没能全程参与课程。

有一天工作人员路过梅阿姨家，问她最近怎么都没有去上课，她说：“最近老头子身体不好，刚做完手术，我很想去学习，真的很想！”她边说边弄白萝卜，她笑着指着手上的东西说：“这是白萝卜啊（普通话）！”顿时，我觉得这些阿姨好可爱！她们的学习热情度高，只是缺乏机会。现在他们有这个机会，却背负着家庭的很多事情，没办法能够全身心投入。

农村教育工作往往都是比较艰难的，同时也是需求非常大的，社区大学为这些农村妇女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对她们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妇女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莆田妇女地位低微，往往都是牺牲自我来顾全整个家庭。比如外出带孩子带孙子，照顾丈夫等职责，所以难免会有不可持续性，这也是整个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村衰败后果之一。